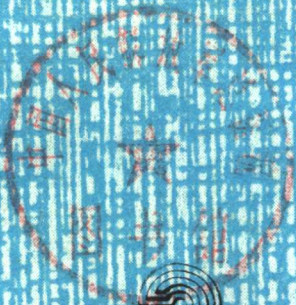


# 统计研究

TONGJI YANJIU

7/20

R04267/0202



2

1990

689

# 中国统计出版社新书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9	8.30元	关于经济效益统计的若干问题	
中国分县农村经济统计概要	27.00元	佟哲辉 编	1.70元
全国百村劳动力情况调查		中国工业经济问题的分析	
资料(1978—1986)	5.80元	国务院工普办 编	5.00元
中国运输邮电事业的发展	14.50元	工业统计分析报告选编	
中国物价统计年鉴—1988	8.00元	国家统计局工交司 编	4.80元
中国建筑业统计资料(1986—1987)	3.85元	运输统计学 杨茂桢等 主编	2.80元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		邮电通信抽样调查 柯金水 编著	2.95元
资料(1986—1987)	5.40元	市场规律浅析与预测基础数据	
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78—1987)	5.20元	张一耿 等编	4.90元
1988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收支		固定资产投资统计问答	
调查资料	16.50元	杨实权 等主编	2.00元
沿海经济开放区经济研究和		经营统计学(日) 栗方忠 等译	3.60元
统计资料	10.60元	社会生产经济效率的统计方法(苏)	
中国台湾省、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泰国、		陆戈 等译	2.10元
南朝鲜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汇编	2.90元	统计学与控制论(苏) 王毓贤 译	1.30元
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职业高中用)		管理决策方法(美) 安玉英 等译	3.40元
向泽松 主编	2.70元	计量经济学入门(英) 陈常志 等译	2.30元
工业统计学(职业高中用书) 陈志成主编	1.75元	怎能利用统计撒谎	1.90元
统计平均分析		股份经济与投资效益 蔡群 编	5.65元
周兆麟 著	2.05元	商情预测——方法及其计算程序(美)	
经济预测的统计方法		黄树颀 编译	3.50元
华伯泉 编著	1.90元	外向型经济统计 林嗣明 主编	6.20元
中国社会指标理论与实践		论费尔马大定理 王健真 著	2.10元
何建章 主编	6.00元	统计之光 国家统计局人事司 编	5.00元

\* \* \* \* \*

订购办法:

请将订书款及邮挂费(购书总额的10%)汇至北京阜外北礼士路北营房东里13号 中国统计出版社发行部

邮政编码: 100037.请在汇单附言上注明所购书目及册数并写清收书人的详细地址及邮政编码。

门市电话: 89. 6694, 发行部电话: 81. 3395.

## 统计研究

1990年 第2期

4月7日出版

(总第34期)

(双月刊)

编辑: 《统计研究》编辑部

印刷: 房山区先锋印刷厂

主编: 莫日达

出版: 中国统计出版社

发行: 北京市邮政局

(北京复兴门外国家统计局内)

订阅: 全国各地邮局

国内统一刊号: CN11—1303

代号82—14

定价: 1.90元

# 统计研究

## 目 录

中国统计学会、  
国家统计局统计  
科学研究所

主 办

1990年第2期

(总第34期)

- 论当前国内经济形势.....章钟基 ( 1 )
- 近十年我国收入分配的特征、问题与对策  
.....邱晓华 万东华 ( 7 )
- 十年价格改革的回顾与反思.....郑京平等 ( 11 )
- 我国劳动力产业结构转变初探.....丁大建 ( 15 )
- 加强党政领导关心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张一耿 ( 19 )
- 从概率统计看指数体系.....孙慧钧 ( 22 )
- 指数体系研究何去何从.....李惠村 ( 27 )
- 全国进出口商品价格统计研讨会纪要  
.....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 ( 31 )
- 目录抽样技术在工业调查中的应用  
.....无锡市目录抽样技术研究组 ( 35 )
- 四川省1987年儿童情况抽样调查的质量控制.....吴祥云 ( 42 )
- 论多主题分层抽样.....肖海峰 ( 46 )
- 对抽样平均误差公式的更正.....李金昌 ( 50 )
- 论统计数字的全面质量管理.....颜德纶 ( 54 )
- DEA方法在企业经济效益评价中的应用.....魏权龄等 ( 58 )
- 通径分析与中国人口控制.....毛慧娜 ( 63 )
- 十年来我国人才统计的实践和新趋势.....俞宗尧 ( 66 )
- 论总体与总体单位、指标与标志的关系.....杨昌斌 ( 70 )
- 西方国家外贸价格指数编制方法简介  
.....傅献国 ( 72 )
- 美国NIPA'S向SNA的转换  
.....戚少成 许宪春 ( 76 )
- 来稿摘登 • ..... ( 79 )
- 编者的话..... ( 80 )

# STATISTICAL RESEARCH

A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Statistical Society of China

No.2 1990 (Series No.34)

## CONTENTS

- On Current Domestic Economic Situation ..... Zhang Zhongji ( 1 )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 Taken  
in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in China  
in Recent Ten Years ..... Qiu Xiaohua Wan Donghua ( 7 )  
A Review on Ten Years Price Reform.....Zheng JingPing, etc ( 11 )  
On the Chang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Labour Force  
in China.....Ding Dajian ( 15 )  
Strengthening the Study of Important Issues Concerned  
by Party and Government Leaders.....Zhang Yigeng ( 19 )  
A Review on Indicator System on the Base of  
Probability Statistics..... Sun Huijun ( 22 )  
What Course to Follow—the Indicator System.....Li Huicun ( 27 )  
Minutes of a Symposium on National Price Statistics  
of Imported and Exported Commodities  
.....UrbanScio-Economic Survey Organization SSB ( 31 )  
Application of Catalogue Sampling Technique in Industrial Survey  
..... Research Group Catalogue Sampling in Wuxi City ( 35 )  
Quality Control of 1987 Sampling Survey of Children's  
Condition in Sichuan Province ..... Wu Xiangyun ( 42 )  
On Multi-subject and Stratified Sampling.....Xiao Haifeng ( 46 )  
Correction of the Formula of Sampling Average Error.....Li Jinchang ( 50 )  
On Comprehensive Quality Supervision of Statistical Data  
..... Yan Delun ( 54 )  
Application of DEA Method in Evaluation of  
Enterprise Economic Effect ..... Wei Quanling, etc ( 58 )  
Path Analysis and Population Control in China..... Mao Huina ( 63 )  
On Rel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Unit, Indicator  
Characteristics.....Yang Changbin ( 70 )

# 论当前国内经济形势

章钟基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经过一年多的治理整顿，我国经济是往好的方向发展，还是向相反方向发展？治理整顿的方针对不对？发展前景如何？这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 一、治理整顿工作初见成效

一年多来，经过全国上下的艰苦努力，治理整顿已初见成效。社会总需求得到明显控制，社会有效供给继续增长，社会总供求之间矛盾趋缓，物价涨势逐月减弱，主要比例关系有所改善，整个国民经济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一) 控制社会总需求取得明显效果，当年社会总供求差率缩小。从需求的几个主要方面看，多年来的投资“饥饿症”得到遏制，1988年第四季度以来，全国停缓建项目1,8万个，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 000亿元，比上年下降11%，扣除涨价因素，实际工作量压缩20%左右。新开项目也比上年减少一半以上，这为今后继续控制建设规模，调整投资结构创造了有利条件。1989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2 640亿元，比上年增长14%，其中奖金550亿元，增长23.6%，同上年增幅相比，分别下降了9.1个百分点和17.4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602元，比上年增长一成以上。1989年商业部门售予社会集团的消费品693亿元，比上年仅增长4%。上述消费需求扣除涨价因素，实际是下降的。

在控制社会需求的同时，社会有效供给继续增长。据初步测算，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15 67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9%，加上进口的扩大，全年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差率，由上年的16.2%缩小为8%左右。由于物价上涨，已将差额大部分吸收，因而当年社会总供求实现基本平衡。这说明，在控制总量平衡上，已迈出可喜的一步。

(二) 货币投放得到有效控制，物价涨势逐月减弱。由于银行采取提高利率、开办保值储蓄和控制信贷规模，以及国家发行保值公债等措施，有效地控制了货币投放。1989年货币发行210亿元，大大低于上年发行680亿元的水平，也低于发行400亿元的原计划。紧缩银根后，物价涨势得到遏制。1989年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上升17.8%，涨幅略低于上年。其中2月份比上年同期上升27.9%，以后各月涨幅逐步回落，12月份仅上升6.4%。1989年物价变动有两个特点：一是新涨价因素明显低于上年。全年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总水平变动中，新涨价因素为6.4个百分点，比上年新涨价因素低9.5个百分点。二是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涨幅明显低于上年。1989年上升16.3%，比上年涨幅20.7%低4.4个百分点，主要是副食品价格得到有效控制。

(三) 过高的工业速度明显回落，基础产业与国民经济不相适应的状况有所改善。在治理整顿中，从中央到地方，都强化了农业的“基础意识”，1989年农业总产值6 550亿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3%。粮食产量40 745万吨，比上年增长3.4%，达到1984年的历史最高水平。

过高的工业速度明显回落，能源、原材料工业生产稳步增长。1989年工业总产值21 880亿元（含村及村以下工业），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3%。增幅比上年的20.8%回落12.5个百分点。由于加强产品结构调整，基础产业生产扭转了年初一度下滑的势头。能源生产总量10亿吨（折标准煤），比上年增长4.4%；原煤首次突破10亿大关，位居世界第一；钢产量登上6 000万吨的新台阶，达到6 124万吨，挤入世界四大产钢国家之列；有色金属、烧碱、纯碱、化肥、农药等短缺产品的生产，也有较大程度增产；由于工业减速“降温”，工业增长速度同农业增长速度之比，由上年的5.3：1，调整到2.52：1；工业增长速度同能源生产增长速度之比，由上年的4.16：1，调整到1.89：1，因缺煤、缺电而停工的情况有了明显减少。交通运输紧张状况也有所缓解。全年货物周转量比上年增长7.2%，货运增长速度同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之比，由0.65：1提高到1.95：1。

（四）对外经济保持发展势头。“六·四”平暴后，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对外经济一度受到较大影响，但从全年看，仍然保持发展势头。据海关统计，1989年出口52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0.5%；进口591亿美元，增长7%。扣除来料加工、无偿捐赠和外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等不收付外汇的进出口后，进大于出28.5亿美元，逆差比上年减少4.3亿美元。进出口结构继续向优化方向发展。非贸易外汇收支继续保持顺差，全年收大于支30亿美元，国家现汇结存有较大回升。在利用外资方面，全年新批准的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56亿美元，实际投入资金33亿美元，比上年分别增长5.6%和4.1%。

上述情况表明，国民经济发展的主流是健康的，中央提出的治理整顿的方针是正确的。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上述转变的基础仍然是脆弱的，有的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如物价涨幅回落，很多地方一靠行政干预，二靠财政补贴，一旦财政承受不了，物价势必反弹；又如开办保值储蓄，发行保值公债，仅仅是推迟了购买力的实现，将为今后还本付息带来沉重的包袱。特别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一些基本因素并没有消除，影响经济稳定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远未解决，同时随着治理整顿的深入，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新旧矛盾交织，增加了治理的难度。

对前些时候出现的市场销售疲软，产品积压严重，企业开工不足现象，我们认为，这些现象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在压缩需求的大环境中，市场销售“降温”有其必然性。从1988年四季度开始，国家实行了“多管齐下”的强力紧缩政策。据测算，因保值储蓄、保值公债、社会集资等减少居民需求约700亿元；压缩投资，减少消费品需求约100亿元；控制集团消费减少消费品需求100多亿元。这三项相加，相当于全年商品零售总额10%左右。此外，上年超前超量抢购，也减少1989年市场需求约300亿元。同时随着宏观环境的改善，消费者出现“买涨不买落”的心理，这些物质和精神的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市场疲软。总的说，市场供求矛盾趋缓，不仅对消费者有利，也符合宏观调控的目标。当然，市场疲软，也会给工商企业带来不少困难，但这些困难是暂时的，是前进中的困难。从表层看，主要是市场滞销引发的社会再生产不能正常运转。从根本上说，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体制缺陷等深层次矛盾造成的，也是消除前几年经济过热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不是治理整顿工作本身带来的负效应。

## 二、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

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采取措施解决工商企业遇到的困难，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面，是着手解决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主要是：

### (一) 社会总需求连年超过社会总供给

1989年压缩需求，仅仅是初步缓解了当年的供求矛盾，并没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1984—1989年，我国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9.9%（按现价计算年增长18.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经过1989年压缩500亿元后，平均每年还增长19%；居民货币收入平均增长20%左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吃老本，靠打赤字预算和大量发票子，靠举借内债和外债支持的。近11年，10年财政赤字，累计700多亿，如按国际惯例，加上内外债，赤字还要翻一番；截止1989年底，未偿还的外债余额超过400亿美元；内债余额800亿元，结余购买力约7000亿元。货币流通量，由1978年末的212亿元增加到1989年末的2344亿元，增长10倍，如果扣除经济发展、物价上涨和现金交易扩大等因素，至少还多发货币500多亿元。与此同时，国家外汇储备以及粮、棉等主要商品储备，比1984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从1990年开始，我们将先后进入内债和外债还债高峰。

### (二) 结构性矛盾突出

1. 工业与农业的比例失调。1979年以来，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进展，农业生产出现了连续六年的全面发展，粮、棉等主要农副产品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的比重，1978年占24.8%，1983年上升到29.9%，1984年占29.7%，以后几年出现了工业高速发展而农业生产低速徘徊的趋势，农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逐年下降，1988年仅占24.3%。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会逐步下降的，但近几年下降如此之大，是不正常的。如果按工业与农业的增长速度比较正常的3:1计算，1988年农业占的比重也不应低于27%。特别是粮、棉、油产量连年徘徊，而人口却每年净增1500万人。1988年与1984相比，人均主要农产品占有量，粮食由394公斤下降为362公斤，棉花由6.1公斤下降为3.9公斤，供需矛盾加剧。我国现有的农业供给能力，支撑不了已经形成起来的过大的工业生产摊子和人口增长的需要。近五年，棉花产量减少1/3，而同一时期棉纺工业加工能力却扩大40%以上。

2. 工业内部比例关系失调。集中表现在能源、原材料工业同其他工业比例失调的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而且有所恶化。能源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1978年占14.1%，近几年大体在10%左右波动，此外，近年来由于家用电器的发展，生活用能源剧增，生产同生活争能源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在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占的比重，由1978年的12%降到1988年的9.5%；原材料工业占的比重，由1978年的35.5%降到1988年的33.8%；制造业占的比重，由1978年的52.5%上升到1988年的56.7%。

3. 运输能力同经济发展的失衡状态进一步突出。1988年同1978年相比，每公里铁路营业里程负担的货物周转量增长70%，负担的旅客周转量增长1.7倍。尽管国家加强铁路新线建设和旧线的技术改造，不少线路铺设复线，干线客运全部采用了内燃机车、电机车，加挂车箱，提高运输能力，但仍不能适应客观需要，铁路运输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目前总运力只能满足实际需要量的60—70%，关键路段只能满足30—40%。从国际统计资料看，我国铁路运输负荷密度相当于美国的3倍，印度的4.9倍，联邦德国的7倍，日本的9.5倍。

### (三) 分配不合理

近几年，收入分配中出现了三个倾斜：一是向个人倾斜，居民可支配货币收入由1978年的1734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8600多亿元，增长近4倍；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48.3%上升到61.4%。二是向预算外倾斜，预算外资金由1978年的347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2270亿元，增长5.5倍；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9.7%提高到19.3%。三是向地方倾斜，随着财政体制改革，地方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84年的43.9%上升到1988年的52.8%。

在个人分配方面，一方面靠工资收入的职工之间，过去遗留的平均主义倾向，没有解决，新的平均主义又有所抬头。奖金、津贴往往按人头发放，提职、晋级中的论资排辈“一刀切”，增加平均主义色彩。据48个城市调查，1988年上半年与1985年同期相比，科研单位的实习研究员与研究员的工资性收入之比，由1:3缩小到1:2；医院的医士和主任医师的工资性收入之比由1:3缩小到1:2.2；高等院校的助教和教授的工资性收入之比由1:4缩小到1:2.1；国家机关的办事员和司局长的工资性收入之比由1:3.1缩小到1:1.6。另一方面，分配不公，不合理的差距拉大，主要表现在广大靠工资收入的职工同许多非生产领域的公司人员之间、同某些从事“第二职业”者之间，特别是同私营企业主和部分个体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由于分配不公，脑体倒挂，助长了一些青少年弃学做工经商，形成文盲半文盲。据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文盲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20.86%，占12岁以上人口的26.77%，其中女性文盲半文盲占38.05%。这种状况确实令人担忧。

### (四) 经济效益差

这是我国经济的致命伤，也是经济生活中存在困难的症结所在。近几年，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但由于原材料涨价，工资奖金津贴增加，产成品成本不断上升，导致利税下降。全民所有制企业每百元资金（包括自有流动资金、贷款和固定资产净值）实现的利润和税金，由1978年的18.3元下降到14元左右，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57年28.3元减少约一半。不少行业和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基本建设方面，由于战线过长，管理不善，盲目建设、重复引进，效益也在下降。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交付使用率，1979年为83.7%，1988年下降到71.1%。有些工程竣工后，不能投产或生产能力难以正常发挥。据对1988年建成投产的56个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的调查，这些项目初步批准的概算为72.8亿元，实际投资103.8亿元，超支42.5%。在56个项目中，投产后生产能力利用率达到70%以上的仅18个，占32.1%；利用率在50—70%的有14个，占25%；利用率在50%以下的有20个，占35.7%，建成后尚未投产的有4个，占7.2%。

## 三、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形成经济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旧体制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也有改革中出现的新矛盾；既有客观条件问题，也有决策、操作失误的影响。主要是：

(一) 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1982年党的十二大曾提出了“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的‘两步走’”的重要战略决策，并将农业、能源、交通和教育列为四个发展重点。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不论是建设还是改革，都表现了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急性病”。不少部门、地区、企业企图通过“高积累”、“高消费”的所谓“双向驱动”来提前实现“翻番”的目标。由于基础未打好，只好靠吃老本和“寅吃卯粮”维持高速度，以致经济过热，经济结构恶化。

急于求成是老毛病，特别是在形势好的时候，这个毛病更容易露头。从历史发展上看，我国经济发展几起几落，在不断调整中前进。大的经济调整就有三次：第一次，1958—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开来，招致严重后果，不得不进行了五年大调整；第二次，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提出了过高的不切实际的目标，要求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1976—1985年的十年中要建成10个“大庆”、10个“鞍钢”等120个大型项目。由于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被迫于1979年开始进行经济大调整；第三次，1984年四季度开始又出现经济过热、需求过旺的问题，当时虽然觉察到了，提出要“软着陆”，实际上未“着陆”又“起飞”了，直到1988年四季度才下决心进行治理整顿。所以当前正在进行的治理整顿，实际上是从前几年开始的经济调整的延续。

我国生产落后，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相对短缺，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一年新增的国民收入约1000亿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相当于全国每人每天一个鸡蛋的钱。而每年新增人口约1500万人，新增国民收入绝大部分要用于新增人口的消费和人民生活的必要改善，只有二三百亿元可用于增加投资。所以，必须量力而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如果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去办力不能及的事，必然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欲速则不达。

**（二）改革措施不配套、不完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揭开了新的篇章。但是也应该看到，近几年，由于经济改革不配套、不完善，在相当程度上导致经济结构恶化和经济效益降低。譬如，中央和地方，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改革，有利于增强经济活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但也出现了决策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和财力物力分散化的倾向。在当前经济关系、价格体系、利率、汇率还没有理顺的情况下，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财政的“分灶吃饭”“大包干”，外贸包干等，强化了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政企不分的现象，助长了地方经济发展中的盲目性和本位主义。有的地方对地区资源、技术和商品实行垄断和封锁；有的地方竞相发展价高利大的“热门”产品，导致大量重复引进、重复建设；又如，企业改革从调整分配关系入手，实行承包责任制，又没有建立相应的自我约束机制，往往产生短期行为。在物价改革方面，出现了“双轨制”的价格体系，形成价格信号的严重扭曲。越是重要的和紧缺的产品、越是大中型骨干企业的产品，计划调拨占的比重越大，价格越低；越是长线产品，越是小企业的产品，计划调拨的比重越小，可以卖高价，刺激了获利丰厚的加工工业和小企业的盲目发展。更严重的是，相差悬殊的多重价格为“以权谋私”提供了滋生土壤，不但加剧了分配不公，而且严重腐蚀了党和政府的肌体。

**（三）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削弱。**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指令性计划范围缩小，一些本应由国家集中掌握的宏观总量的调节机制，被层层切割给各级地方政府。在局部利益的驱动下，往往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执行中央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远不如前。如果依靠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调控，目前这方面手段又不健全，加上国家直接掌握的财力、物力有限，也难以起到决定全局的作用。1988年预算内财政收入2628亿元，仅相当于当年国民收入的22.3%，比例之低是世界上少有的。

#### 四、摆脱困境的设想

当前治理整顿工作，已由以压缩总量为主的阶段，开始转入在控制总量的前提下，以调整结构、提高效益为主的攻坚阶段，这也是关系到治理整顿成败的关键阶段。因此，应着重抓好几件事：

**(一) 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无论是控制需求、调整结构，还是增强宏观调控能力，都要对现有的利益格局进行必要的调整。各地区、各部门、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从大局出发，把行动真正统一到十三届五中全会的精神上来，共同分担国家困难，做到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共同把治理整顿搞好。当然，调整利益格局也要适度。我们必须克服急于求成的老毛病，无论是治理整顿期间还是治理整顿任务完成之后，都必须始终坚持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的方针。当前要注意防止两个倾向：一是急于解决眼前企业困难，盲目松动银根，放弃总量控制，以致治理整顿工作“前功尽弃”，造成社会需求再度膨胀；一是急于达到治理整顿目标，一味紧缩总量，加大力度，以致激化新矛盾，影响社会安定。

**(二) 积极调整经济结构。**经济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关键在于结构合理，比例协调。在治理整顿期间，把过大的社会需求压下来，过高的工业速度降下来，这为合理调整经济结构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调整结构第一位的是大力加强农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基础。要尽快扭转粮棉生产连年徘徊的局面。同时，要努力增加能源、原材料的生产运输。要按产业政策的要求，切实调整投资结构，进一步压缩一般性投资，增加基础产业的投资，重点是增加农业、煤炭、石油、电力和铁路建设的投资。

**(三) 治理整顿要同深化改革相结合。**我们既要注意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不能轻率地否定过去出台的改革措施，以保持大局的稳定；又要重视某些改革出现的负效应，积极探索完善改革的措施和试点工作。改革的部署要从过去“摸着石头过河”转变为在总结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中长期规划，进一步明确具体的改革方向及目标，确定每个时期改革的重点及各项综合配套的改革措施，推进改革的顺利进行。完善改革的措施，要有利于结构调整和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有利于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分配关系的合理化；要把技术进步作为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建立调动企业技术进步积极性的经济环境和经济机制，对科技、智力密集型的产业，实行重点倾斜政策，使我国经济从高积累，低效益，高投入低产出的老路上摆脱出来；要在继续搞活微观经济的同时，着重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管理，适当集中财力、外汇、物力，提高中央的总量调控能力。当然，这里所说的集中，是在发挥中央、地方、企业正当积极性基础上的适度集中，不是说要回到以前高度集中的老路。

**(四) 整顿市场秩序，加强监督管理，严格控制市场物价上涨。**尽管1989年以来市场零售物价涨幅逐月回落，但价格总水平仍然居高不下，潜在的涨价压力仍然存在，稍一放松，有可能导致新一轮涨价，影响市场稳定。同时，市场秩序混乱局面尚未根本治理，违法乱纪现象仍多。因此，要继续把整顿流通秩序放在重要位置，促进正常的经营活动的开展。要继续严格物价管理权限，未经审批，不得随意涨价。要在控制物价过程中，把握时机，积极稳妥地解决“双轨制”价格问题，切实理顺一些极不合理的价格关系。

**(五) 治理经济环境同治理社会环境结合进行。**近几年，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社会上出现不少丑恶现象，“向钱看”的歪风席卷全国。如何建立新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重整全民族的精神，也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一手抓治理经济环境，一手抓治理社会环境。各级领导要带头搞好廉政建设，改进领导作风，团结广大群众，同社会上丑恶现象作斗争。加强思想教育，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优良传统，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 近十年我国收入分配的特征、问题与对策

邱晓华 万东华

近十年间,随着国家分配政策的调整和改革,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本文拟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对我国近十年收入分配的基本特征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作一初步描述,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 一、收入分配的特征

### (一) 从纵向比较的角度来考察,我国十年收入分配状况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第一阶段(1979—1980年):“还欠帐”阶段。三中全会以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消费倾斜政策,逐渐趋向提高收入、提高物价、提高消费的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措施主要包括:(1)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79—1980年两年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提高了30.8%;(2)从1979年11月起,国务院决定对机关、事业单位40%的职工进行升级和工资调整。另外还拿出320万元用于追加高教、科研、卫生、体育和文艺部门中的中高级知识分子调整工资,使这部分人的实际升级面达70—80%;(3)继1978年恢复了企业的奖金制和计件工资制后,对部分企业又实行了企业基金制度;恢复了发展个体经济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相继出台,使居民货币收入得以迅猛增长,1979—1980年年均增长23.1%,几乎为前26年间年均增长6.1%的4倍。然而,“还帐”的步子迈得过急,超过了生产承受的可能,致使市场物价急剧上升,财政连年出现大额赤字,各种经济比例关系更趋恶化。国家被迫进行了一次大的经济调整。

第二阶段(1981—1983年):调整阶段。这一时期,银根抽紧、基建规模压缩、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放慢。1981—1983年增长38.9%,年均增长11.6%。影响居民收入增长趋缓的主要因素是:(1)严格控制调资面。文教、卫生系统,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的升级和工资调整分别放在1981年、1982年、1983年三年间进行;(2)禁止滥发奖金、津贴。(3)稳定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三年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年均仅增长6.1%。由于调整有方,措施得力,经济发展很快就摆脱了困境,重新走上了协调、稳定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

第三阶段(1984—1988年):收入增长失控阶段。1984年以来,在城市结合搞活企业,国家相继推出了承包、租赁、股份等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大多数企业实行了奖励基金同企业经济效益一起浮动的办法。少数企业进行了职工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挂钩的试点。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1985年开始实行了以职务工资为核心的结构工资制度。流通领域更加放开搞活,个体经济繁荣活跃。对外门户越开越大。在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给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农民增收开辟了重要的渠道。然而,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偏差,错误地提倡脱离国情的高消费,特别是在放权搞活的同时,

出现了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的弱化和缺位，企业和职工自我约束机制不健全，舆论导向的错误等，再加上国外消费示范效应和国内收入增长强烈攀比的双重驱动，很快把居民收入推向了高速增长的轨道。1984—1988年五年间，我国居民货币收入年均增长22.6%。居民收入高速增长，物价涨幅1988年创纪录地达到18.5%。消费品进口急剧扩大，1984—1988年生活资料进口年均增长15.8%。市场供需缺口扩大，其中1984年为-398亿元，1988年达-800亿元。这表明，收入分配中出现了比例失衡的趋势，已给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第四阶段（1989—）：降温阶段。从1988年第四季度起，针对经济过热、投资规模过大、消费需求过旺、物价上涨过快等一系列矛盾，中央决定实施治理整顿的方针，采取了财政、信贷“双紧”，投资、消费“双控”等降温措施，严格控制社会集团消费，加强了工资基金的管理，堵塞乱发奖金、滥发实物的各种渠道，整顿流通秩序，清理“皮包”公司，严惩贪官污吏，使过快的收入增长出现了减缓趋势。从1989年7月份以后，职工的工资、奖金增幅平均每月以3个百分点的幅度下跌。全年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首次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特别是一部分企业开工不足，使部分职工收入程度不同地受到影响。由于乡镇企业发展的不景气，建筑市场的萧条，农村计划外用工、合同工的大量清退，从事非农产业的收入有所减少，农民全年实际收入大体与上年持平。社会集团购买力也受到较大限制。这说明经过一年多的治理整顿，城乡居民收入和集团购买力增长过快的势头已开始得到抑制。与之相对应的是，市场开始降温，供求关系开始改善，进口受到明显控制，市场物价涨幅逐月跌落，从10月份开始，零售物价涨幅已降到一位数。

## （二）从横向比较的角度来考察，我国十年收入分配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增长性

1. 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呈交替上升之势。1979—1984年，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推进和完善，农民的生产热情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再加上国家几次大幅度地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货币收入增长较快，六年间年均增长22.3%，远快于1978前26年年均增长5.2%的速度。相比之下，城市改革尚未全面铺开，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六年间年均递增12.4%。农民与非农业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缩小，由1978年的1:2.9缩小到1984年的1:2.3。1984年后，改革的重心移向城市，承包、租赁、股份等各种经营责任制相继推出，企业自主权扩大，职工收入增幅提高。特别在市场发育不全，价格体系不完善，计划、市场双轨价差大，国家宏观调控滞后的条件下，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腐败和违法乱纪现象，使一部分人的非法收入、高额收入急剧膨胀，助长了城镇居民收入的过快增长，1985—1988年年均递增24.6%。而农村，由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缺乏新的动力，加上近几年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暴涨，使农民从农副产品提价中所得好处明显减少。尽管乡镇企业的迅猛崛起使农民从非农产业中得到的收入增多，但从整体上来看，还是赶不上城镇居民，1985—1988年年均增长21.4%。业已缩小的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差距又被重新拉大，由1984年的1:2.3扩大到1988年的1:2.6。

2. 社会阶层中，出现了一批高收入群体。目前社会上的高收入者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阶层。一是部分个体户和私营业主；二是一部分利用业余时间兼职或从事第二职业的职工；三是一些企业承包、租赁者；四是部分运输部门的货运司机和出租汽车司机；五是一些“走穴”演员；六是一些堕落、腐化的政府官员。粗略测算，1988年上述高收入者仅占城镇职工23%，然而，他们所掌握的货币收入却占整个城镇居民收入的45%强。

3. 居民收入高低分布比例不对称。在农村居民中，人均年纯收入在千元以上的农户占

9.4%，不足300元的占18.8%。城镇居民中，人均月生活费收入在150元以上的户数占8.4%，不足70元的占26.2%。低收入户数所占比重还是偏高。

4. 农民收入东高西低，呈梯度分布态势。1980年，我国东、中、西三个经济地带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17.8元，181元和170元，东、中、西之比为1.28:1.06:1。八年后，这种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依然如故，且愈加扩大。1988年，东、中、西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683元、490元和424元，三者之比为1.61:1.15:1。东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第二、三产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

### (三) 从收入来源来考察，我国十年收入分配又呈现出多渠道、多元化的格局

1. 农民收入来源由过去集体统一分配为主朝家庭经营为主、集体为辅的格局转变，从以农业收入为主转为农业、非农业等多层次复合结构方向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部分农民开始摆脱土地的束缚，农民收入格局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农民从集体统一经营中得到的收入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66.3%急剧降为1988年的9.1%；家庭经营纯收入上升为农民收入的主体，由1978年的26.8跃升到1988年的83.2%。在农民的生产性纯收入中，非农业生产收入所占比重已由1978年的7%上升到1988年的27.3%。

2. 城镇居民收入已由过去标准工资“一统天下”逐步朝标准工资、奖金、津贴“三足鼎立”的格局转换，非工资性收入增长迅猛异常。(1) 职工工资收入中，奖金、津贴迅速增长。以全民所有制单位为例，1979—1988年十年间，职工工资总额年平均递增14.4%，而奖金、津贴年平均递增速度却分别高达39.9%和28.9%。十年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增加1338.4亿元，其中由于奖金增加300.3亿元，占22.4%；由于津贴增加356.2亿元，占26.6%，二者合计占全部工资增加额的49%，已成为职工工资收入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因素。(2) 非工资性收入直线上升。统计资料表明，城镇居民职工工资外收入占全部货币收入的比重已由1978年以前的约10%上升为1988年的40%左右。

## 二、收入分配的问题

### (一) 从总体上来看，十年收入分配带有明显的超前意识

十年改革，首先从过去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收入分配体制入手，企业自主权扩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改善了社会有效供给。然而，由于没有在宏观管理上和微观经营中建立健全的约束机制，人们要求改善生活、增加收入的愿望过于强烈，攀比收入倾向十分突出，居民收入出现了超常规增长。1979—1988年十年间，我国居民货币收入年均增长19.8%，而同期国民收入年均仅递增9.2%，收入的增长大大超过了生产承受的可能，加剧了市场的紧张状况，造成国家财政连年赤字。近几年的通货膨胀使相当一部分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前些年盲目追求收入高速增长带来的“后遗症”。

### (二) 收入分配明显向个人倾斜，但收入的转化渠道却十分狭窄

十年改革，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79年国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4.1%，1988年下降到20.1%，下跌了14个百分点，而同期居民可支配货币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由1979年的48.5%跃升为1988年的61.1%，上升了12.6个百分点。个人收入的迅速扩张，除了正常的调整分配格局影响外，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蚕食国家收入和企业收入所致。

与此同时，居民个人的消费领域仍十分狭窄，特别是城镇居民大量的购买力仍然主要指

向吃、穿、用等有限的商品。在1988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非商品性消费只有8.16%，与1982年的8.25%没有多大差距。消费渠道狭窄更趋突出，又主要在于收入分配中的实物化倾向的强化。不仅由国家配给的实物仍然十分普遍，由单位配给实物的趋势也愈演愈烈，其实是消费的非市场化。它是物价急剧上涨、结余购买力大量沉淀的重要成因。

### （三）平均主义与分配不公交织并存

一方面，在以工资收入为主的阶层中，平均主义仍占主导地位。从国际上通用的反映个人收入差异程度大小的基尼系数来看，十年间，我国城市的基尼系数基本平行伸展，没有明显变化。农业居民中，由于生产环境、生产门路的不同，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程度不同，收入差距有较大拉开。

另一方面，分配不公矛盾十分突出。当前收入分配不公最集中、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脑体倒挂”问题。从不同行业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工资的情况不难看出，知识分子较为密集的机关、教育、科研、文化艺术等单位的工资水平明显低于体力劳动者集中的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地质普查和勘探业的工资水平。如果与个体户、私营业主、出租汽车司机等高收入者相比，差距显然还会更大。这种与贡献大小脱钩的收入分配的极大不公，严重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同时也引起了社会不满情绪的滋长和蔓延。

## 三、收入分配的对策

（一）注意在搞活收入分配体制的同时，进一步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合理控制收入总量的过快增长。要坚决贯彻量力而行的原则，确定合理的比例，速度要适当，步子要稳妥，采取适度消费的战略，把居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的改善，建立在经济超前发展、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要加强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用政策的、经济的、法律的杠杆加强和改善对收入分配的管理，实施放活与管紧相结合的原则。

（二）注意在加强就业统一安排的同时，破除僵化的旧劳动体制，允许科技人员、工人、干部有择业的自主权，使劳动者能在公平的起跑线自由竞争，这样可以从很大程度上改变目前的攀比心理。同时，要完善企业承包制，制定规范的企业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办法，建立独立的厂长经理基金，通过完善各种承包制度，形成一个新的既代表国家利益又代表企业利益的中间管理阶层。

（三）注意在加强行政管理的同时，建立健全各种经济法律，加强税收对公民收入的调节作用。对不按法律办事的单位和个人，都要严格惩处。对执法人员违法现象，要实施严厉的经济处罚，并提交经济法庭论处。对一些低收入公民，要通过建立社会救济制度，或适当调减税率予以优抚。对那些风险大的企业，要建立风险基金加以保护。真正体现收入分配中“合法的要保持，不合理的要限制，非法的要取缔”的精神。

（四）在加强商品性回笼货币的同时，充分利用银行杠杆的作用，加强收入的合理分配。制定合理的利率，扩大储蓄品种，吸收居民购买力。

（五）注意在继续推进收入市场化改革的同时，逐渐推进消费市场化的改革。

（六）注意在加强对个人收入分配管理的同时，努力加强对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控制，树立廉洁风气。

（七）注意在理顺个人分配关系的同时，纠正各种畸型消费。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 十年价格改革的回顾与反思

郑京平 季也平 刘秋生 张朝煌

## 一、十年价格改革的回顾

10年来,我国的价格改革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以调为主的前期(1979~1984年);二是调放结合的后期(1985~1988年)。第一个阶段,国家以有计划地理顺价格为主,主要进行了6次较大规模的价格调整。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农副产品、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等基础工业产品的价格。这一阶段物价总水平基本上是低幅上升。第二个阶段,国家开始侧重于价格形成机制的转换,采取以有计划地调整价格和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放开价格同时并举的措施,迈出了三次较大的步伐。继放开小商品价格之后,国家先后放开了部分轻纺工业品价格,自行车等耐用消费品价格,以及名烟、名酒的价格,并几度试图放开猪肉、蔬菜等副食品价格。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可以说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价格改革调放结合的特点。这一阶段物价总水平呈现出激升的趋势。到1988年末,各种商品价格属于国家定价的比重明显下降。在农民出售农产品总额中,属于国家定价(包括加价)部分的比重,已由1984年的67.5%,下降到1988年的20%左右。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属于国家定价部分的比重,从1984年的73.5%降为1988年的30%左右。

## 二、对十年价格改革的基本评判

(一) 10年来,我国的价格改革取得了显著进展,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 实现了三个突破。在物价理论上,突破了不承认价值规律对资源配置有调节作用的框框,国家开始自觉地利用价格机制的作用。在物价方针上,突破了长期实行的“一般不动,个别调整”的消极稳价方针的束缚,开始着手结构性调整。在物价管理上,突破了集中管理,单一价格形式,企业无定价权的模式,实行了多层次定价,多种价格形式并存的体制。

2. 初步缓解了四大矛盾。一是初步缓解了工农业产品交换差价偏大的矛盾。10年来,国家通过调高和逐步放开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等措施,使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1.47倍,而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仅上升38.5%。农产品交换工业品的数量平均增加了76.6%。二是初步缓解了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产品价格同加工工业品价格的比价偏低的矛盾。10年来,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的产品价格分别上升了1.16倍和83.3%,而加工工业品价格仅上升54.8%。这为加快能源、原材料等“瓶颈”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是初步缓解了同类商品各项差价偏低,特别是质量差价偏低的矛盾。如今优质优价,同类产品的差价已扩大了几倍,十几倍。从而,较好地体现了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对提高产品质量起到了较明显的作用。四是初步缓解了价格管理体制中过份集中的矛盾。企业和地方对产品的定价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运用价格杠杆创造了条件。

(二) 价格改革经历了10年的探索之后,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1. 物价总水平登高与价格改革相伴而行。10年中,我国零售物价指数上升了72.6%,平均每年递增5.6%。1979年,国家大幅度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肉、禽、蛋、菜、奶

和水产品等八类副食品的零售价格，使零售物价指数上涨水平登上了第一个台阶，1980年，全国零售物价水平比上年提高6%。1985年，国家有指导地放开了猪肉、部分蔬菜等副食品的价格，放开了部分轻纺工业品价格，使零售物价指数上涨水平登上了第二个台阶，1985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上升8.8%。1988年，由于部分大城市工业品调价过于集中，国家和地方政府陆续调高肉、蛋、菜、糖等主要副食品零售价格，以及普遍放开13种名烟、名酒的价格和调整部分名优彩电的价格，使零售物价指数上涨水平，在连续三年较大幅度上涨的基础上再次登高，达到了18.5%，创建国后的最高纪录。无可否认，价格改革绝非物价上涨的本质原因。但是，在我国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社会总供给，货币发行缺乏硬约束，攀比涨价机制尚存条件下，结构性的价格调整确实成了物价上涨的直接诱因。

2. 不合理的比价正在复归。一方面，采掘、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品的价格，在经历了“优先”提高之后已开始出现“滞后”。而加工工业品价格则呈现出快速上涨势头。价格改革的第一阶段，采掘、原材料、加工工业品价格的年上涨幅度分别为7.6%、4.0%和1.4%，而在价格改革的第二阶段，三者的年上涨幅度分别为8.1%、9.7%和9.2%，加工工业品的价格已快步赶上。如此发展下去，采掘、原材料、加工工业品价格的比价势必要回归到价格改革之前。另一方面，价格作为调节资源配置的有效杠杆，远未达到合理的要求。

需要得到加强的交通、能源、原材料等行业的资金利税率并未有大的改善，有些行业还有所恶化。冶金、电力、煤炭、石油、建材、森林、铁路、邮电等8个基础行业中，达到或超过平均利税率的只有3个行业，其余5个行业远远低于平均利税率，其中煤炭行业已经出现了较严重的亏损。而化工、机械、食品、纺织、造纸5个加工行业中，有4个行业超过平均利税率，最高的食品行业竟超出1.5倍。

3. 价格管理仍不合理。一是国家价格管理机构缺乏必要的权威性；二是价格调控手段仍不够灵活，还处在以行政干预为主的阶段；三是对流通环节的管理薄弱；四是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检查机制，对违反物价政策的行为惩处不力。

### 三、价格改革陷入困境的原因

10年价格改革，之所以会陷入“比价复归，总水平攀高”的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总体上讲，是我们忽视了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事实。往往站在发达国家商品经济和市场发育的高度或者站在传统的集中统一计划经济的模式上观察或处理我国的价格改革，许多方案的设计和实施都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低，商品经济不发达，各种经济体制并存等一系列本质特征。具体而言有下述五个主要原因：

1. 目前“理顺价格关系”的经济环境比较差。所谓理顺价格关系，就是依照某种标准，由政府调整各行业及行业内部产品的比价，使之趋于合理。实现这一目的基本要求是：调控者能及时掌握全面丰富的定价信息；各行业生产经营活动较为规范。而我国目前的状况是，各行业生产经营活动极不规范。行业之间，行业内部国营、集体、乡镇、合营、外资、私营企业之间竞争条件差异悬殊；改革进程中经济环境变化极大。更为扰人的是，我国目前的信息采集和传递系统，难以及时地为政府提供全面的定价信息，因而行业的叫喊声成了调价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个行业提价，必然造成连锁反应。企业的经营活动，一旦出现亏损（或利税率低于平均利税率），不是从行业内部找原因，而是从提价上找出路。

2. 价格形成机制尚不健全。价格形成机制包括国家宏观调控机构和较完整的市场体

系。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商品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但市场体系极不发达。除消费品市场外，资金、技术、劳务、信息、债券等市场还处于萌芽状态，社会主义统一市场更是远未形成。一方面企业未做到自负盈亏，也未实现自由流动，一些企业还是靠国家补贴度日。这样，价格作为一种信号就无法发挥正常作用。另一方面，现有的市场，规则不清、秩序紊乱，加上其他经济机制、行政手段和各种非道德规范因素等侵入商品交换之中，搅乱了正常供求对价格的作用和价格对供求的反作用导致了价格信号的失真。此外，国家调控机构横向与纵向的关系也远未理顺，控价手段还十分乏力。

3. 长期积累的隐性矛盾，伴随着新的失衡矛盾一并暴发。改革前，我国主要实行了低工资、低物价、按票证配给的供应体制，对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四大总量的平衡极为重视，采取了许多强制性措施。社会总供求平衡的状况较好。但是，在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方面欠了帐。人民生活改善甚微、商品票证等黑市交易猖獗的现象已隐含了经济短缺的矛盾。改革使企业经营开始活起来，但由于改革措施不配套，宏观调控措施没有及时跟上，使隐性矛盾显化的同时，新的供需失衡矛盾又出现了，这就加剧了短缺的程度。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供需缺口不断扩大，供需差率已由1983年的4.6%上升到1988年的16.2%。社会结余购买力迅速积聚，1988年末，已激增到5500亿元，比1978年扩大了10.4倍。财政的大量赤字，货币的过度扩张也使通货膨胀的危险成为现实。改革10年，我国财政赤字累计达648亿元，如按国际惯例，扣除内外债务，净赤字高达1708亿元。高额赤字又迫使银行超量发行货币，10年累计，净投放货币1900多亿元。1988年末，我国市场年末货币流通量达2134亿元，比1978年末增长了9倍多。

4. 改革急于求成。价格改革的第一阶段，国家对物价上涨持谨慎态度，物价控制一直较严，1979~1984年6年累计，零售物价水平上涨17.7%，平均每年上涨2.8%。1984年以后，为了适应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各级政府加快了价格改革的步伐。在这一阶段中由于忽视了我国价格形成机制发育严重不足，以及供需矛盾尖锐的现实，过快、过于集中地放开了一些商品的价格，想一下子闯过价格关，加上“通货膨胀无害论”的影响，一度放松了对价格的管制，没有及时采取相应配套的综合治理措施，因而，短短4年，零售物价总水平上涨了46.6%，年平均递增10.0%，达到了中高度水平。

5. 价格“双轨制”使市场价和计划价相互刺激轮番上涨。价格“双轨制”是在我国能源、原材料既不能用偏低的计划价格敞开供应，又不能很快地把偏低的计划价格放开的情况下，实行渐进式价格改革的产物。“双轨制”的设计者，原企图通过市场价格的示范以及计划价格的约束，在不致造成物价涨幅过大的条件下，使两种价格逐渐归一，走出一条对供不应求的产品进行价格改革的新路子。但是，这一改革遇到了“权力商品化”这一劲敌，加上这几年经济过热造成的原材料、能源严重短缺，“双轨制”不仅未能实现改革的初衷，相反，却成了近年物价水平暴涨的重要成因之一。市场价格上涨，对计划价格形成涨价压力，而计划价格一提高，市场价格又会自然上涨，出现了相互刺激，轮番上涨的局面。此外，计划内产品转为计划外销售，劣质产品充计划，优质产品进市场的“串轨”现象，以及供给者囤积倾向的强化等都加快了物价水平的上涨。

#### 四、深化价格改革的大致思路

我们认为价格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就其总体目标而言，应该是建立一个少数重